

“层累说”起源新论

李长银

摘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据《顾颉刚日记》所示,顾颉刚是在得到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启发后,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伊始便建构了“层累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从历史本体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认识论层面,“层累说”均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这一学术关联的发现,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顾学”研究者不仅要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还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顾颉刚;“层累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简介:李长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DOI:10.13613/j.cnki.qhdz.002266

特定的历史时代往往因特定的历史事件而被打上特定的历史印记,20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完全可以因“层累说”的提出而被概括为一个“疑古”的时代。然而,就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李学勤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①的演讲,“走出疑古时代”由此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正面交锋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在这股“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潮及“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正面交锋之中,“疑古”时代的中心理论“层累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不过,大多数学者因受到“走出疑古时代”思潮的影响而主要检讨的是“层累说”的内涵及意义,而对这一学说的主要理论来源关注较少。^②因此,笔者拟从更具原始资料性质的《顾颉刚日记》提示的一些材料入手,对“层累说”形成的来龙去脉及主要理论来源重新加以梳理与考察。

一、学术因缘

“层累说”是贯穿整个“古史辨”运动的中心理论,它的提出不仅标志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更昭示着一个“疑古”时代的到来。关于“层累说”形成的来龙去脉,顾颉刚本人最先现身说法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之中,后世学者在论述时亦从其说,但问题在于:他们的论述未能对顾颉刚在文中提到的一些至为关键的点予以足够的重视。

“层累说”的提出是一个从雏形到定型的过程。“层累说”的雏形是顾颉刚在编纂《现代初中教科

① 该文经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1992年第7期。

② 据笔者所知,近年来,学界对“层累说”的提出做了一些“探源”性的工作。李锐《经史之学还是西来之学——“层累说”的来源及存在的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认为“顾颉刚的‘层累说’受胡适的影响很大……看起来是中西结合产物的顾颉刚的‘层累说’,更多地体现了西方学术研究的视角。”赖国栋《再论“层累说”的来源——兼谈历史与故事的距离》(《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认为“实际上,就‘层累说’命题而言,它主要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戏曲、歌谣和民俗学研究;二、进化论等西方近代科学思想;三、前人辨伪学和今古经学家学说。”

书本国史》(以下简称《本国史》)伊始建立起来的一个假设。1922年春,顾颉刚为了照顾其病重的祖母而请假归家,并在胡适的介绍下开始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本国史》。与其他编者不同的是,顾颉刚打算编纂一部“成为一家著述”的教科书。而此时的顾颉刚正走在“疑古”的道路上,因而他决定撇开三皇五帝的系统,只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具体而言,古代对于禹的观念,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土下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閟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缙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中的‘禹稷躬耕’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缙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同理,“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粲然大备了。”在这一古史人物变迁的指示下,顾颉刚推定“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等到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概言之,古史人物“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于是,他初步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①这一假设就是“层累说”的雏形。

然而,就在“立了这个假设而尚未作文的时候”,顾颉刚不得不因他的祖母过世而暂时停止《本国史》的编纂工作。直到半年之后,他才再次回到商务印书馆,继续从事《本国史》的编写工作,并在这次工作中深化了对“层累说”的认知。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通过对《尚书》中关于古史话的指摘比较,发觉“西周人的古史观念实在只是神道观念,这种神道观念和后出的《尧典》等篇的人治观念是迥不相同的”。所以,“神道观念”愈强的篇章愈是早出,而“人道观念”愈强的篇章愈是晚出。而这种观念的变迁“就是政治现象从神权到人治的进步”的反映。^②

1923年2月,钱玄同寄给顾颉刚“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得他“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于是,他“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覆书,除讲《诗经》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③然而,时隔两个月有余,顾颉刚并没有收到钱玄同的回信,因而他决定将有关“古史见解”的那部分截出,并在“按语”部分提出“层累说”,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刊发在了《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层累说”由此得以定型。

当然,以上关于“层累说”形成过程的论述是“顾学”研究者再熟悉不过的事实了,但笔者想借此进一步指出的是,“层累说”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因缘于《本国史》的编纂。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学术因缘因没有其他材料的佐证而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实际上,这一学术因缘是探讨“层累说”极为关键的一点。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忽视它的客观存在,在“层累说”的学理分析上便会出现很大程度上的结构性缺失乃至偏颇。

如前所述,顾颉刚是在打算编纂一部“成为一家著述”教科书的伊始,初步建构了“层累说”这一假设。不过,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部旨在“成为一家著述”的《本国史》是有所“本”的,而这个“本”就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下简称《研究法》)。1921年10月16日,《顾颉刚日记》载:“(练)为璋带来任公《中国史学研究法讲义》,读之如我心中说出,盖即我要说之话,要本这意见预备编书的。快极,拟摘要抄录。”^④而此处的《中国史学研究法讲义》就是《研究法》的最初稿本。不过,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顾颉刚在实践层面有没有按照《研究法》编纂《教科书》呢?当然,《研究法》是一部有本于西方实证史学而主讲史学方法的书,甚至可以说开启了新历史考据学派无数治学的法门,但该书的主旨却是“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的著作。^⑤换言之,顾颉刚所谓的“意见”,就

①②③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28—29、29—30、30页。

④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2页。

⑤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是梁启超所言的通史“作法”。统观《研究法》,梁启超所言的“作法”集中地体现在《史之意义及范围》一章里。简要言之,梁氏设想今日要撰成一部“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中华民族如何由各族混合淳化而成,民族间的关系和中华民族活动范围的拓展,与世界的关系,政治制度和组织、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民族思想和思潮演变等。^①而《本国史》本于《研究法》编书的意见主要体现在“编辑大意”之中。质言之,《本国史》的主旨在于,“历史应当注意事实的因果,不能拘于朝家的更迭……时代精神是历史的主眼,如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的风尚,学术的嬗递,凡足以表现当时的特征而影响及于后世的,本书便取材于此,都为简单的系统的介绍”。^②合而观之,《本国史》确是顾颉刚有本于《研究法》而编纂出的一部历史教科书。如前所述,顾颉刚又是在有本于《研究法》编纂《本国史》的伊始便发现了“层累说”。因此,在“层累说”的学术因缘上,梁启超的《研究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学术关联

笔者从历史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三个层面剖析“层累说”与《研究法》之间的学术关联。^③

所谓历史本体论,其核心就是社会历史观。历史进化史观的引进与运用是中国史学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尽管以往有的学者认为顾颉刚因受到崔述《考信录》的某种暗示而提出了“层累说”,^④换言之,《考信录》中表述的一些见解^⑤是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逻辑起点,但问题是,“崔述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感性认识,而不是像‘古史层累说’那样已抽象为系统的理性认识。”^⑥其实,历史进化史观才是“层累说”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顾颉刚本人的现身说法,他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⑦此处所谓的“新史观”就是历史进化史观,而“古史传说的怀疑”则主要指代的是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

当然,这种认识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的一种共识,但笔者想借此进一步追问地是,顾颉刚的历史进化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往的学者多认为,顾颉刚这一历史进化观念的形成主要源于胡适,除胡适之外,则还有严复、章士钊、康有为等人,^⑧但都忽略了梁启超的影响。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顾颉刚最初是从梁启超那里接触到历史进化史观。进化史观是经由严复《天演论》传入中国的,但必须说明的是,顾颉刚是在1916年报考北大文科时才对该书进行了研读。^⑨而早在1904年,他已然在《新

①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10页。以下简称《研究法》,文中夹注。

② 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③ 2006年10月21日至22日,“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王和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指出“今天我们对于古史辨派及其疑古学说的影响、意义及现实定位,可以从本体论、方法论及认识论等几个层面做出新的评价。”(刘秀俊《“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文史哲》2007年第1期)这一思路也为笔者分别从以上三个层面剖析“层累说”的学术资源提供了借鉴。

④ 参见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⑤ 比如,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说“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尧,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牺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⑥ 参见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7页。

⑦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⑧ 参见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63—164页;吴少琨,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96—97页。

⑨ 参见顾颉刚《我在北大》,见《宝树园文存》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9页。

民丛报》上读到了梁启超的《新史学》，而该文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历史进化观的名作。此外，他还对梁启超其他有关历史进化史观的文章进行了诵读，甚至达到了每读一文，即另立小标题加以研读的地步。^① 再从实际的效果来看，顾颉刚受梁启超的历史进化史观的影响较为深远。1916年，顾颉刚考入北大哲学门，之后他在章士钊、胡适等人的演讲或论著中体悟到了历史进化史观，但即是此时，他的文章仍然还保留着梁启超式历史进化史观的痕迹。比如，他在这年的1月底写了一篇《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该文运用的便是进化史观的历史解释。值得关注的是，他不仅在内容上两次提到《新民丛报》，而且连题目也有仿梁启超当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之，梁启超之著述是顾颉刚历史进化观念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尽管梁启超晚年对进化史观有所怀疑，但直到《研究法》问世之时，他对历史进化史观的信奉并没有动摇。比如，在《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一章中，对历史下的定义仍然是进化史观的历史解释；在《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亦是借社会进化学说解释古史问题和古书真伪问题；《研究法·史迹之论次》更是通篇阐述进化史观中因果关系。因而，当顾颉刚在有本于《研究法》而编纂《本国史》之时，贯彻的原则之一便是《研究法》体现出来的历史进化观念。而前已指出，顾颉刚就是有本于《研究法》编纂《本国史》之时建构了“层累说”，因而，从历史本体论的层面来看，梁启超《研究法》中展现的历史进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层累说”展开的逻辑起点。

假如说梁启超《研究法》中体现的历史进化观念仅为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提供了逻辑起点，那么，“层累说”实际上则多赖《研究法》表述的方法证而成之。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层累说”问世不久，胡适便向学界宣布，顾颉刚证成“层累说”的主要方法取自自己发明的“历史演进的见解”，甚至将此视为顾颉刚讨论古史的“根本方法”。^② 以往学界因胡、顾的关系及胡适“科学”方法代言人的身份认同而将这一说法信为言之凿凿的事实，但在笔者看来，胡适的说法尚有商榷之处。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简要地说就是“以演进观点看待史料并进而辨真伪明演化”。^③ 换言之，这一方法由两部分构成“演进观点”和“辨真伪”。所谓“演进观点”也就是“进化观念”，因为“演进”就是“进化”的另一种译法，而“辨真伪”就是审定史料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历史演进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受到了《研究法》的启迪，因为无论是“演进观点”还是“辨真伪”都是《研究法》主体部分要申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一，在顾颉刚看来，“演进观点”就是“依了时代去搜集材料，从各时代的材料中看出各时代人对于古代的中心人物的观念的演变”。^④ 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法于《研究法》中的这样一条表述，即“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研究法》，第84页）。顾颉刚就是“拿了这种变迁的例来看古史的结构层次的”，从而得到了“一个亲切的理解”，^⑤并以此建构了“层累说”。第二，在顾颉刚看来，“中学”里的“辨真伪”，几乎就等同于“西学”话语里的“审定史料”，因为“要汇集史料，审定史料，于是要‘辨伪’”。^⑥ 顾颉刚就是运用这些“审定史料”的方法建构出“层累说”的。其中，《尧典》的真伪问题是构建“层累说”的一个关键要素。顾颉刚说：“《尚书》中除了后出的《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故尧舜

① 参见顾颉刚《我在辛亥革命时的观感》，见《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481页；郭绍虞《悼念顾颉刚》，《读书》1982年第10期，见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页。

②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1册，第165页。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67页。

④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189页。

⑤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30页。

⑥ 参见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41页。

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①因而“我对于古史的最早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②如此来看,《尧典》被预设为晚出的“伪作”是“层累说”成立的一个必要前提。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曾明确地说“《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③经查证,“蛮夷猾夏”和“金作赎刑”均出自于梁启超的《研究法》(《研究法》,第92页),且是顾颉刚在有本于《研究法》编纂《本国史》之际抄录下来的“史料”。^④换言之,《研究法》中的这两个判断为顾颉刚判定“《尧典》的靠不住”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总之,无论是从“演进观点”还是从“辨真伪”的层面来看,被胡适定义为“历史演进的见解”的“顾学”主要方法与梁启超《研究法》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不仅如此。从方法论的层面检视“层累说”,还必须兼顾此法在实际应用上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肇因于我们之前探讨出来的此法的理论来源。

“层累说”在方法论层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1925年,张荫麟在《学衡》上发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文中提出“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氏的“层累说”。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⑤对于张文,史学界几乎一致认可,^⑥顾颉刚本人也一直没有进行明确的反驳,^⑦因而他对“默证”的误用遂成定论。在笔者看来,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究竟存不存在“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而顾颉刚在“层累说”的建构上为什么会如此自信地应用“默证”之法,甚至他在张荫麟提出批驳之后还继续“肆无忌惮”地应用此法,也是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换言之,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被学界普遍认定为“默证”之法的理论来源是什么?

张荫麟批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他说“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在他看来,法国史家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是这类“西方史家”的代表,因为瑟诺博司在《史学原论》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论述。《史学原论》是西方史学的一部名著,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上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有论者指出,《史学原论》借助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因而该书的英译本在“层累说”问世之前已在中国学人之间广为传阅。^⑧但是,顾颉刚并不精通英语,因而我们有理由推定顾氏并未研读过英译本的《史学原论》,而获知“默证”一说。

事实上,顾颉刚是最早从《研究法》中接触到“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的。《研究法》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史学原论》,这一事实判断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默证”即是其中具体而微的一个例证。《史学原论》指出“运用推理之道有二,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而“消极的推理,亦可称之为‘默证’”。^⑨梁启超在《研究法》中则做了如下的援引,他说“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

① 参见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见《古史辨》第1册,第122页。

②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189页。

③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78页。

④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77页。

⑤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见《古史辨》第2册,第199—200页。

⑥ 张荫麟提出“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之后,在史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参见卢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时至当下,这一问题还困扰着学术界。有提出质疑的(参见彭国良《一个流行了八十多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文史哲》2007年第1期),亦有批判质疑者的(参见宁镇疆《“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⑦ 参见《古史辨》第1册后附《古史辨第二册拟目》中,有顾颉刚《答张荫麟》一文,但终没有刊发。

⑧ 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⑨ 李思纯所译《史学原论》并未将“Argument from silence”译为“默证”,为了对照起见,该处转引自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册。

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而所谓“消极的史料”就是“默证”。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完全照搬《史学原论》中关于“默证”的见解。他在《研究法》中一改《史学原论》中对“默证”的消极乃至否定的态度,而给予了积极、肯定的估价。他认为,此等“消极的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画者于不着笔墨处传神”,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四个借“默证”之法以证成事实的例子,以说明他的见解。笔者还注意到,除了《研究法·史料搜集与鉴别》一章中对“消极的史料”作了专论之外,梁启超还在《研究法·说史料》一章中也提到了“消极的史料”,他认为,群经之中若《尚书》、《左传》、《诗经》、《仪礼》、《论语》、《孟子》等皆是先秦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瑰宝”。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指出,“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研究法》,第64、65、50页)。换言之,在梁启超看来,“消极的史料”的重要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尤其可以应用在先秦史方面是“绝好史料”。进而言之,顾颉刚最早是从《研究法》中知晓“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一说的,但他接受的却是与《史学原论》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的说法。因此,“层累说”之所以存在“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与《研究法》中的表述密切相关。

“层累说”的发现,除在历史本体论、方法论层面与《研究法》存在学术关联外,即是从后见之明的认识论层面来看,“层累说”也能从《研究法》中找到对应的学术资源。一般来看,顾颉刚的方法系统还应包括“移置法”,^①但与其将“移置”视为一种方法,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观念或一种认识,而归到历史认识论的范畴。^②“移置”的观点最先明确地表达在“层累说”的第三个意思上,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③之后,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给出了明确的阐述,他说:

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是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是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例如《易传》,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荒谬如讖纬,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汉代宗教史料。逞口而谈古事如诸子,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战国社会史料和思想史料……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④

关于“移置”观念的来源,以往学界也有所探究,但均没有提供出任何有力的证据。^⑤据《顾颉刚

① 许冠三认为“移置法不但是顾氏爱用的‘独门秘籍’,而且也是他辨伪学的实质起点。”见氏著《新史学九十年》,第205页。不过,有的学者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比如王汎森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中经过一番细致的思想史的分析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古史辨运动最大的盲点之一是把书的真伪与书中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伪书中便不能有真史料。”(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296页)而这一“结论”显然是与“移置”的观念相违背的。

② 比如,王学典指出,“层累说”实质上是历史认识论层面的一个重要命题。见王学典、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③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76页。

④ 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自序》,第4—5页。

⑤ 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第一,许冠三认为,顾氏“移置”的见解来源于康有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03页);第二,卢毅认为,这一见解或许来源于钱玄同,并举出钱氏于1922年之后表达的关于这一见解的一些模棱两可的证据,因而,他在表达观点时特意加了“或许”的字样(参见卢毅《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东方论坛》2006年第6期);第三,这一见解或可以上溯到胡应麟,但其所举出的证据亦甚为薄弱(参见王嘉川《论胡应麟对伪书价值的认识》,《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5期)。

日记》所示,顾颉刚在作《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的第一天便突然阅读了《研究法》。^①循此思路,我们发现《研究法》载有这样一段话:

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例如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之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臧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臧作,亦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礼》谓为周公作固伪,若据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亦绝佳的史料也。(《研究法》,第85页)

比照之下,“移置”的观念与《研究法》中“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的见解几乎是如出一辙。当然,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明确表达的“移置”的观念不能完全代替“层累说”的第三个意思,但前者显然是后者的延续与完善。因此,即是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来看,“层累说”都与《研究法》存在着内在的学术关联。

由此来看,从历史本体论到方法论,再从方法论到认识论,“层累说”都能在《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也只有从这一学术关联入手,我们才能有效地回答往昔学术界在探究“层累说”主要理论来源问题时所不能解答的“难题”,比如,“层累说”为什么会存在“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及“层累说”第三个意思中蕴含的“移置”的观念的主要理论来源是什么等问题。因此《研究法》是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

三、两点启示

第一,在“顾学”研究上,“顾学”研究者决不能以顾颉刚所言皆为是,必须对其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层累说”与《研究法》的学术因缘与学术关联之所以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主要在于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并未做到“如实直书”,即顾颉刚并未对梁启超及著述过多地着墨,涉及“层累说”之处虽然言及编纂《本国史》,但并未“如实地”交待《本国史》实乃是他有本于《研究法》而编纂出来的一部教科书。因而,当后世学者本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而探讨这一问题之时,难以发现这一既定的历史事实。此外,顾颉刚在《自序》中至少还有一处未能“如实直书”。他在回溯因“层累说”的发表而引发的古史大论战发生时说“自从《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我和玄同先生两篇文章之后,刘楚贤、胡堇人二先生就来书痛驳。”^②大多数“顾学”研究者因未能对此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便以顾颉刚所言以为是。比如,被誉为“顾门的翘楚”的刘起舒说“顾颉刚在1923年5月《读书杂志》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首先是钱玄同先生在答书里赞扬顾先生这一古史意见……接着是刘揆藜、胡堇人二位先生提出了很强烈的反对意见”。^③实际上,这种描述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因为刘楚贤早在钱玄同撰文之前便已写好了驳文,并寄到了《读书杂志》编辑部。^④换言之,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576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30页。

③ 刘起舒《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2—105页。除刘氏外,《顾颉刚评传》、《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的作者皆持相近的看法。参见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1—62页;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1页。

④ 据刘文所示,刘文写作于1923年5月13日;据《顾颉刚日记》所示,刘文于5月22日由胡适处转到顾颉刚手中(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361页),这就是说,至少在5月22日之前,刘文便已寄到了《努力》杂志社。而即便是这一时间,也早于钱文的1923年5月25日。

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后,钱玄同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之前,刘楚贤便进行了“痛驳”。由此两例来看,研究者必须对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否则,一些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就不能被完整地、真确地还原出来。进言之,只要历史研究还需要“审定史料”,顾颉刚及“古史辨派”所从事的“辨伪的工作”就不会过时。

第二,在“古史辨”研究上,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影响。如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而“层累说”一经问世,一场以“学风南北”的中国古史大论战就此拉开;1926年,顾颉刚将各方讨论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31年,《古史辨》第三册出版,意味着“古史辨运动”由“古史辨”转向“古书辨”。第三册收录的是《易经》与《诗经》的考辨文字。而顾颉刚就是在该册的《自序》中借《易经》与《诗经》的考辨问题提出了“移置”的观念,而前已指出,这一观念得之于梁启超在《研究法》中表述的一条辨伪原则。当《古史辨》出版到第四册,“古书辨”则由考辨经书转向考辨诸子。因为《古史辨》第四、六册又名《诸子丛考》与《诸子续考》。而其编者罗根泽明确地说“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是使我由研究诸子学说而走入考订诸子真伪年代的原动力。”^①如此来看,《古史辨》第四、六册两册之所以呈现出“诸子丛考”的面貌主要得之于梁启超、顾颉刚的影响,二人在诸子年代考订上的相通之处也由此可见一斑。在诸子年代考订的具体问题上,《老子》年代的考辨最能体现二者的学术关联。在《古史辨》第四、六册中,《老子》年代的考辨占的比重最大,多达三十五六万言。而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是由梁启超引起的,更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基本认同梁启超的意见。他说“二千余年来……大家以为老子一定是孔子以前的人,《老子》一定是《论语》以前的书……十五年前,适之先生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仍作如是观。这本来是一件可以不生问题的事。不料梁任公先生竟提出反驳,以为《老子》必是战国时的书,他说的话比较陈师道们的透辟得多。这么一来,影响到我们的学术史观念,顿时起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在我的理性的批评之下,觉得梁说是对的。”^②当然,《古史辨》在出到第三册便出现了一个从“古史辨”到“古书辨”的转向,但并不是说“古史辨”学人放弃了“古史辨”,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古史辨”。因此,讨论今古文学的《古史辨》第五册便穿插在旨在考订诸子的《古史辨》第四、六册之中。《古史辨》第五册分上下两编,上编讨论的是汉代今古文学的本子问题,下编讨论的是汉代今古文学的学理问题中的“阴阳五行问题”。值得关注的是,“阴阳五行问题”亦是由梁启超引发的。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叙及这册书的由来时坦白地说“阴阳五行问题是梁任公先生提出,而刘子植先生集成的,我和这些师友们常在一块,当然要受些他们的影响。”^③其实,顾颉刚不仅在这一问题的思考上与梁启超产生了共鸣,还基本认同梁启超考察这一问题的思路与见解。1923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提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之末,邹衍是此“妖言之作俑者”。^④此说一出,批驳者甚多,但顾颉刚基本认同梁氏的看法,他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中的引论部分即着重说明“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后期”及“邹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两个意思。^⑤如此来看,七册《古史辨》之中,至少有五册与梁启超著述有着或多或少的学术关联。这一事实也注定了梁启超在《古史辨》的学术版图上占据着一个丝毫不亚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核心位置。

(责任编辑:邱永志)

① 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自序》第22—23页。

② 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的成书年代》,见《古史辨》第4册,第310页。

③ 顾颉刚《古史辨》第5册《自序》,第9页。

④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见《古史辨》第5册,第204—205页。

⑤ 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见《古史辨》第5册,第240页。

century when it became a necessary tool for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such as Leopold von Ranke. This review introduces and ass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nt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book's approach,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and writing. It also acquaints the readers with Grafton's scholarly lineage and many contributions. This review points out that the footnote manages to reject the teleological approach by associating various historians' usages of footnotes with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 and culture in each of the 17th,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t reveals numerous schola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hat were previously neglected in modern scholarship and reminds the readers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footnote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s originat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Recent Advances in Big Data, New Historical Facts and Social Theory: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New Research Using University Student Records Liang Chen, James Z. Lee

Student academic records are a universal source of systematic social information. However, since these materials are not a commonly recognized historical source, few historians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such records. Nevertheless, the rises of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tific History (QUASSH) and big social scientific data have lead to the discovery of such important source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Moreover, recent collections and analyses of such data are uncovering important new historical facts not well documented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ources. Historian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abundance of such in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 and the scholarship of discovery produced by social scientific history to advance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ory of Heaping up Is from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Li Changyin

Liang Qichao'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is pivotal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diary of Ku Chieh-ka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ory of Heaping up* not only derives from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What is more, the corresponding academic resources of *Theory of Heaping up* can be found in the book from view of history, method and cognition. The fact indicat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discern Ku Chieh-kang's idea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Liang Qichao's academic effect on Ku-shih-pien.

The Key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on Dialects in Northwest Regions——Mainly on Gansu, Ningxia, Qinghai, and Xinjiang Provinces Xing Xiangdong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scored in studying on dialects in northwest regions, among which many significant works on regional dialect studies have been created, finding out lots of linguistic facts and taking a more deeper study on theory, which forms a better learning styl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lie in great unbalance in regions, timing, places and cont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factors urging us to do some important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on dialect in northwest regions. One is the great value of language recourses in these regions, such as complicated evolution of language, many kinds of access to language, highly simplified tones and neutralization of tone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between Hui nationality and Han nationality; the other is linguist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language history in northwest regions, cultivation of talented personnel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northwest regions, as well as ethnical unit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lso talks about aims and plans to carry out the key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like principles of choosing a place, investigation outlin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us for key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on dialect in northwest regions.

(下转封三)